

# 2016-2017 年度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 早期臺灣史 \*

鄭維中 \*

### 一、前言

本文主要對於 2017 年 5 月起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為止，歷史學界中對於臺灣早期歷史之研究有所貢獻的出版物做一簡要回顧。此處所說的臺灣早期歷史，大約從十六世紀中期，東北亞與東南亞之歷史均發生變動的「早期全球化」時代開始，迄十七世紀末期清廷領有部分臺灣，遂行其邊疆治理的時代為止。關於「前殖民」時代的研究，或有與考古研究重疊者，也隨附列出。本文文末將所回顧的文獻書目附上，其中主要為已出版的學術論著，散見於臺灣史、中國史、海洋史、臺灣文學、文化研究等各種領域，筆者參酌其學術貢獻與關懷之處，與以上所說之早期臺灣歷史研究有相當關聯者，收錄並簡要討論之。

### 二、荷西相關研究

#### (一) 經濟史與環境史

2016-2017 年臺灣史研究中，與荷蘭人、西班牙人殖民臺灣時期有關的研究，有相當重要的進展。例如 2017 年，古慧雯〈十七世紀荷日貿易中臺灣所扮演的角色〉一文，結合了前人如永積洋子、吳聰敏、Robert LeRoy Innes 的研究，加入了新興研究者如 Hoang Anh Tuan、鄭維中的研究成果，並且極為細緻的重新檢驗與修正，又將自己過去數年來的研究成果總結於此，完整地勾勒荷治時期生絲、鹿皮、砂糖這些貨物在對日貿易中所佔的比重與角色。她指出，「絲與絲製品原本是中荷貿易最重要的商品...荷蘭人可藉由絲綢取得日本的貴重金屬，融通亞洲內部貿易。」<sup>1</sup> 但是鄭芝龍獨攬中日貿易後，臺灣轉運的地位不再有利，於是「重重困難中，臺灣的本土

---

\* 作者感謝美國 Emory 大學歷史所博士生盧正恆與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生徐子懿協助收集書目。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sup>1</sup> 古慧雯，〈十七世紀荷日貿易中臺灣所扮演的角色〉，《經濟論文叢刊》(臺北)46:2(2018年6月)，頁 209-234，於頁 20。

物產提供了 VOC 意外的貿易機會，尤其是鹿皮在日本的獲利甚高；不過，這無法與早期絲的利潤相比。」<sup>2</sup> 古慧雯的研究所探討的對象有部分與鄭維中的作品重疊，即”Emergence of Deerskin Exports from Taiwan under the VOC (1624-1642)”，不同之處在於，鄭維中解釋了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所以能夠打入日本的鹿皮市場，其實是暹羅內亂後，日本人僑民失勢，意外給了荷蘭人機會所致。這個觀點著重於國際關係演變對於荷蘭人決策的影響，以及此一現象對於臺灣社會造成的衝擊。2016 年吳聰敏發表有〈從貿易與產業發展看荷治時期臺灣殖民地經營之績效〉，不探討臺灣的轉口貿易經營而專門探討本地產業的經營，因此也涉及上述鹿皮貿易的問題。本文解答了為何荷治末期帳面上仍有利潤，但臺灣被鄭成功奪取後，巴達維亞當局卻不認為應該奪回臺灣這個矛盾現象。他推估臺灣主要產業鹿皮、糖與「內地諸稅」之經營，實際於 1650 年代不敷本地投入基礎設施的成本，沒有利潤，造成巴達維亞當局傾向撤出的判斷。<sup>3</sup>同樣，他也指出影響本地經營的因素中，中國內戰的角色頗為吃重。文中說明，臺灣本地經營利潤最高的 1649 年，主要是因為福建收購鹿肉價格飆高，也推升了出口稅與內地諸稅。這顯示了對中國貿易如何強烈衝擊本地經營的成敗。<sup>4</sup>

由以上三文可見，荷蘭統治時期，臺灣決策當局不斷調整與適應周邊貿易情勢的變化，也造成臺灣內部經濟環境與生態環境的變化。清華大學碩士徐子懿的論文《荷蘭時代臺灣稅課與漢人經濟社會的形成（1624 年至 1640 年代中期）》可說如同吳聰敏一文同樣將焦點著重於殖民地經營，但希望集中探討荷蘭人治理與唐人移民關連者。其結論清楚指出臺灣唐人移民在所謂「共構殖民」的發展中，既為荷蘭政府招引，又為荷蘭政府稅基，這種雙重角色，實與中國本身貨幣經濟成熟有關。因此，唐人移民社群的擴大，也代表著殖民政府能透過貨幣經濟穩定抽取稅款獲利，此為殖民政府從無到有營造的經濟環境之一，也因應著周邊情勢的變化而有所發展。<sup>5</sup>曾華壁發表”Sugar Cane and the Environment under Dutch Rul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Taiwan”一文。曾文主要針對荷蘭東印度公司引進蔗作的歷史事實，探討其對於本地社會及環境所造成的衝擊。曾華壁認為，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所斷言，鄭成功驅逐荷蘭人，遂使臺灣免於遭受甘蔗種植園的單一作物之害，此一論斷有待修正。她承認，荷蘭人引進蔗作，對於臺灣環境造成衝擊。而鄭成功以降的漢人社會，確實不施行如同種植園般的，單一經濟作物種植方式。但她認為，這是荷蘭人治臺當時，已經不得不適應的結果，而非完全由政治勢力的變遷所決定。<sup>6</sup> 因為，荷治時期來臺採取蔗作的大墾戶，勢必種稻，以餵養農民。故這樣的轉變，不完全是政治勢

<sup>2</sup> 古慧雯，前引文，頁 21。

<sup>3</sup> 吳聰敏，〈從貿易與產業發展看荷治時期臺灣殖民地經營之績效〉，《經濟論文叢刊》（臺北）44：3（2016 年 9 月），頁 379-412。

<sup>4</sup> 吳聰敏，前引文，頁 403-404。

<sup>5</sup> 徐子懿，〈荷蘭時代臺灣稅課與漢人經濟社會的形成（1624 年至 1640 年代中期）〉（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2016 年 7 月）。

<sup>6</sup> Tseng, Hua-pi., “Sugar Cane and the Environment under Dutch Rul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Taiwan,” in Cristina Joanaz de Melo, Estelita Vaz, Lígia M. Costa Pinto (ed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Making Volume II: Acting*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 2017), pp. 189-200 at 189.

力變遷的結果。<sup>7</sup> 在這一點上，曾文與鄭文都注意到國際貿易引發的荷蘭人舉措，與本地社會的互動。所不同的是曾文著重於漢人種植文化與臺灣生態環境的關係，鄭文所著重的是暹羅、臺灣與日本間鹿皮消費市場的連動關係。鄭維中另有關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所從事的中印貿易的研究如下“Putchock of India and Radix China: Herbal Exchange around Maritime Asia via the VOC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sup>8</sup> 此文主要以木香與土茯苓兩種持續於中印兩大地區交換的藥物，作為探討荷蘭東印度公司治理下的臺灣，如何一度取代澳門，成為中國取得印度貨物轉口港的案例。此文並未探討臺灣社會因此受到的影響，但仍多少能說明，當時臺灣透過荷蘭東印度公司所連結貿易網絡的範圍。若林正文日前於師範大學演講時，曾提出「帝國之網」與「帝國之鑿」的概念，來將吳睿人所提出「帝國之碎片(fragment of/f empires)」的概念來加以深化。<sup>9</sup> 此處筆者試將前面所述的 7 篇文章，納入這些概念當中來探討。古慧雯所探討荷日貿易當中臺灣的角色，可說是解釋在荷蘭這個貿易帝國的網絡之中，作為轉口港的大員曾扮演那些角色。這些貿易品的轉換，也都是在帝國的流通網絡當中，取得市場流通的地位而造成。而吳聰敏所說臺灣本地經營利潤飆高，也來自於中國內戰造成鹿肉價格升高、臺灣湧入難民造成糖產擴增的影響。同樣，如荷蘭人對於鹿產制訂保護措施，或是如曾華壁所說引進唐人農民開墾土地種蔗，對於環境所造成的衝擊等等，則是因應著帝國的需要由「帝國之鑿」對於本地社會與環境所造成的衝擊與反應。但是以上「帝國之網」的伸縮，也必須要顧及每個帝國本身勢力的興衰，及其與周邊國家勢力的關聯性。鄭維中以上兩篇文章，正能說明荷蘭貿易網絡的發展，無法完全依循己意任性而為，而是在周邊地域種種不同勢力交疊下，歷經不斷妥協與順應的結果。這種順應與妥協的過程，如同曾華壁一文所示，也發生在「帝國之鑿」嘗試對於臺灣環境加以改造的過程中。徐子懿關心荷蘭當局引進唐人發展為貨幣稅基的變化，是種內外勢力交織狀況下的發展。就此而言，臺灣歷史的發展也有相當的環節仰賴機遇(contingency)。鄭維中〈1624 年大員港的浮現：兩場遙遠戰爭的遺緒〉可以說是運用上述觀點，將臺灣歷史發展的種種動力源，追索到諸帝國間的交涉之下，所造成的地緣政治結構上面。因之探討大員港興起的「歷史機遇」。<sup>10</sup> 這也可說是將「帝國之網」的概念，向前加以引申適用。

## (二) 歷史地理與地景地名、語言遺緒

同樣，鄭維中另一文〈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在臺海兩岸間的水文探測活動

<sup>7</sup> Tseng, Hua-pi., *ibid.*, pp. 197-199.

<sup>8</sup> Weichung Cheng, "Putchock of India and Radix China: Herbal Exchange around Maritime Asia via the VOC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30:1(2018), pp. 117.

<sup>9</sup> 若林正文，〈「帝國」的「網子」與「鑿子」——思考「臺灣來歷」的複合性視角〉師範大學演講(2018-3-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PZGMssdapI>

<sup>10</sup> 鄭維中，〈1624 年大員港的浮現：兩場遙遠戰爭的遺緒〉，收於李其霖編，《宮廷與海洋的交匯》(新北市：淡大出版中心，2017 年 7 月)，頁 203-226。

(1622-1636) 則與曾華壁呼應，探討荷蘭人在遂行其意志時，必須如何順應臺海周邊的水文環境與特殊的地理狀況。<sup>11</sup> 鄭文指出在長達十年的水文調查過程裡，荷蘭人參考臺海唐人漁民與水手的知識與技巧，發展相應的船隻型態與航行路線。這些與曾華壁所說，荷蘭人引入蔗作時，不得不容許墾首適量種植稻米的情況類似。兩者都說明了，本地的特殊人文與地理自有其底層結構。雖然荷蘭人想盡力運用之，卻有不得不服膺的限制。康培德教授的“From Whale Bone (Walvis Been) to Table Mountain (Taffelberch): the Place Naming of the Dutch on the Landscapes of Seventeenth century Taiwan”一文，所探討的則是海洋地景與荷蘭人命名地名的關聯性。<sup>12</sup> 海洋地景代表了荷蘭人帝國網絡意欲觸及的範圍，又代表了荷蘭水手航行必須仰賴的標的，兩者結合，則造成荷蘭人對於特定海洋地景加以命名的結果。雖然荷蘭人以及西班牙人，大部分的命名方式，在語音上，都沒有為後來的漢人所繼續使用，但其中仍有一些共通性延續下來。例如澎湖的桶盤嶼，原先荷蘭人稱為小桌島，都是描寫低矮的構造物。而荷蘭人描寫某些延伸到海上的沙汕為鯨魚骨，後來漢人則稱之為「鯤鯨」，在語意上仍有延續。<sup>13</sup> 這點可以看作是廣義的「帝國之鑿」所遺留的痕跡。地景的研究，當然也包含了古蹟建築的方面。董純好的碩士論文《熱蘭遮城功能之變遷（1624~迄今）》，特別針對熱蘭遮城由荷治時期到當代，如何由一個具備軍事功能的建築，轉變為觀光遊憩地點作出調查。董文特別關注帝國遺緒與臺灣各個時代變化當中，此一有起始性意義的文化地景，曾經被置於怎樣歧異的文化脈絡中去詮釋。<sup>14</sup> 與此類似的有李德河〈荷蘭人的澎湖城與大員熱蘭遮城〉，著重於探討熱蘭遮城建立時所使用的澎湖建材。根據其考證，臺灣歷史發展經過中，原來取自澎湖的花崗岩石材最後成為當前熱蘭遮城風景區中，古堡頂層花壇的材料。<sup>15</sup> 這是以地景物質材料的留存史，來彰顯地景的「連續性」的意義。洪傳祥《臺灣與麻六甲的荷蘭港埠歸劃溯源》一書，所探討的則是「城市空間布局」的遺緒。作者選取了阿姆斯特丹、麻六甲與安平市鎮三者作相互比較，可以說是在過去的帝國網絡中選取較具代表性的案例來探討。其目的，也是在於「為隱晦混沌的臺灣早期歷史，找出一條具有承先啟後連續意涵的線索。」<sup>16</sup> 只是作者並不滿足於有形的地景、建材與尚能發聲的地名，而希望能找出「佈局」的遺緒。另外，石萬壽〈鄭氏三世建置媽祖廟新探〉與陳緯華〈國家、象徵暴力與民間信仰：以鹿耳門天后宮為例的討論〉其實都是對於臺南地方政府與文史工作者，涉入公共歷史建構的情況做多方面的探討，兩

<sup>11</sup> 鄭維中，〈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在臺海兩岸間的水文探測活動(1622-1636)〉，收於劉序楓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台北市：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8年1月)，頁385-440。鄭維中另一篇文章則是將前文中關於荷蘭船隻如何橫渡臺灣海峽，再做深入探討，請見：Weichung Cheng, "Sailing from the China Coast to the Pescadores and Taiwa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semblances in Chinese and Dutch Sailing Pattern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BEFEO)*, 101(2016), pp. 289-323.

<sup>12</sup> Peter Kang, "From Whale Bone (Walvis Been) to Table Mountain (Taffelberch): the Place Naming of the Dutch on the Landscapes of Seventeenth century Taiwan," *Nomina Africana*, 31:1 (Apr. 2017), pp. 69-76.

<sup>13</sup> Peter Kang, *ibid.*, pp. 74-75.

<sup>14</sup> 董純好，〈熱蘭遮城功能之變遷（1624~迄今）〉(台南市：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

<sup>15</sup> 李德河，〈荷蘭人的澎湖城與大員熱蘭遮城〉，《碇碇石》86(2017年3月)，頁126-141。

<sup>16</sup> 洪傳祥，《臺灣與麻六甲的荷蘭港埠規劃溯源》(台南市：成功大學出版社，2017)，頁127。

文中歷史學者與人類學者就地方廟宇史應該如何切入探討的表達方式，足以互相參照。<sup>17</sup>

對於前述帝國之鑿遺留痕跡的追尋，自然也延伸到語言領域。由於語言是人與人互動所必須依循的社會環境結構，在特定的條件下能夠完善的保存帝國遺緒。康培德〈十八、十九世紀巴達維亞唐人對殖民地行政體系的文化認知賦予與重塑——以《公案簿》中的官職、機構外來語為例〉一文，便是脫離地景，而由制度持續存在的角度去觀察唐人對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官方機構如何稱呼。康培德因此舉證，《明實錄》當中的「高文律」一詞，應該如同巴達維亞唐人稱「敖文律」一樣，所指的是荷蘭文的長官 *gouverneur* 一詞。康培德因此以擴大語料庫、尋找福建人創造外來語的規律的方法，推廣到歷史考證當中，使對於語言遺緒的考察，能對恢復歷史現場有所貢獻。<sup>18</sup> 高賢治〈從古地圖看臺灣名稱的由來〉也是由語言遺緒中去探討臺灣地名之源流。惟其所舉出的關鍵證據並無詳細註釋，有所缺憾。<sup>19</sup>

### （三）殖民統治、抗拒與傳教史

2016 年康培德教授所發表《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一書，為作者將其十年來所發表於各處的文章，結集出版的作品。本書以第三者的視野，從人口、婚姻、聚落、公司治理、殖民想像等論題，由下而上，逐步構建起在荷蘭治理臺灣影響圈內與影響圈外的殖民者與原住民間，相互交織的歷史發展路徑。以此為基礎，透過極細微的權力展演，觀察原住民頭人在複雜的社會變動當中，於殖民權力結構縫隙裡面，流露出種種不按理出牌的巧妙身段，是兼具理論與經驗資料的好作品。2017 年在前述歐陽泰等人所編著“Early Modern East Asia: War, Commerce, and Cultural Exchange: Essays in Honor of John E. Wills, Jr.”這本論文集之中，包樂史(Leonard Blussé)也運用近年所出版的新史料，結合過去邱馨慧等人的研究寫成“Dueling wills, Dutch administration and Formosan power, 1624-68”一文。<sup>20</sup> 包樂史在此文中以相當的篇幅，論述荷蘭人與宜蘭原住民的互動，而特別凸顯巴賽人的中介角色。文中也大量應用了“Formosan Encounter”第四冊當中，所揭露的新資料。包樂史藉其中發掘的範例來說明，荷蘭低階人員、原住民中介者與原住民部落人員當中利害交織的複雜情況，難以用殖民-反抗這一簡單軸線來看待，與康培的前作頗有呼應之處。至於是否能建構原住民於帝國接觸之前的歷史？康培德於 2017 年底出版〈「王國」再現？從文獻與考古資料看十七世紀「大肚王」的地域勢力〉一文或可視為對此問題的

<sup>17</sup> 石萬壽，〈鄭氏三世建置媽祖廟新探〉，《新世紀宗教研究》，15：4（2017），頁 59-85；陳緯華，〈國家、象徵暴力與民間信仰：以鹿耳門天后宮為例的討論〉，《文化研究》，25（2017），頁 139-182。

<sup>18</sup> 康培德，〈十八、十九世紀巴達維亞唐人對殖民地行政體系的文化認知賦予與重塑——以《公案簿》中的官職、機構外來語為例〉，《漢學研究》35：1（2017），頁 261-290，於頁 270-271。

<sup>19</sup> 高賢治，〈從古地圖看台灣名稱的由來〉，《臺灣風物》67：4（2017 年 12 月），頁 11-18。文中以為原居安平的原住民因荷蘭人佔據安平而退居台南府治東郊長興東里大灣庄，而荷蘭文獻可為之證明。惟文中並未附註說明哪一份文獻有此記載。

<sup>20</sup> Kenneth M. Swope, Tonio Andrade eds., *Ibid.*, pp. 65-82.

回應，他指出根據目前考古研究的成果，即便早期番仔園類型生業型態已經是以農業為主、漁獵為輔，甚至晚期番仔園文化的農業已經相當發達，歷史文獻中卻無記載其集中控制農業產品，按照層級體制分配的情況。因此，無法認為已經有社會階層化的發展。但參考其他如泰國、占婆的歷史發展經驗，部落首領若控制外來奢侈品交易，也有可能促成階層化的發展。臺灣平埔族是否有類似的發展，尚待更多考古資料的檢驗。刊載前文的《地下與地上的對話-十七世紀的臺灣與周邊》一書中，尚有郭素秋與劉益昌兩位考古學者，嘗試以彰化平原的考古資料與文字史料對話。郭素秋推測體現貓兒干文化的「虎尾壠人」之跨部落勢力，可能受到荷蘭人的運用，來制衡體現番仔園文化的「大肚王跨部落勢力」。<sup>21</sup>劉益昌則認為從考古遺物來看，貓兒干文化從 12-13 世紀即與中國人初步發生交換關係，並持續至 16-17 世紀。二林港作為彰化平原對外接觸的口岸，因此發揮相當的作用。<sup>22</sup>此一看法與前述康培德、郭素秋的見解有呼應之處，值得觀察其後續發展。以上研究均為嘗試推敲前殖民時代歷史概況者。陳維鈞在介紹臺灣考古進展的工具書中指出，臺灣鐵器時代考古發掘的成果，已經能夠直接與歷史時代的原住民記載相對應。如十三行文化即對應凱達格蘭人、烏崧文化對應西拉雅人、北葉文化對應排灣人等，已為考古學界普遍認知。<sup>23</sup>

2017 年度，則有三篇比較傳統的傳教史作品發表。一者為林昌華所發表”The First Episode of Formosa Church: Robertus Junius (1629~1643)”<sup>24</sup> 主要以尤羅伯牧師作為敘事主軸，來講述荷蘭改革派教會於臺灣的宣教歷史，主張只有馬偕牧師能夠超越其成就。Natalie Everts 所發表的”Siraya Concepts of Marria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Sincan: Impressions Gathered from the Letters of Two Dutch Missionaries”則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荷蘭牧師在新港村社的傳教成果。儘管如林昌華所言，尤羅伯牧師隔離了原住民女祭司並去除了墮胎的風俗，但 Everts 卻指出新港人並未全盤接受牧師所推行的一夫一妻制。很可能原住民僅是部分接受了基督教的原則，並將之扭曲而適應原先新港人的風俗。<sup>25</sup>此外，鮑曉鷗(J.E. Borao)則發表了”The Formosa Catholic Mission, 1626–1895”一文。<sup>26</sup> 本文簡要交代了在西班牙人對日本與中國傳教的背景下，於基隆與淡水的傳教事業，以及原住民的反抗。然後繼續說明十九世紀中期之後，由於打狗開港，西班牙傳教士再度來

<sup>21</sup> 郭素秋，〈彰化平原史前末期與 17 世紀跨部落勢力關係探討〉，收於陳玉美、郭素秋主編，《地下與地上的對話—十七世紀的台灣與周邊》（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 年 12 月），頁 67-113。

<sup>22</sup> 劉益昌，〈存在他者記憶的人群— Favorlang〉，收於陳玉美、郭素秋主編，《地下與地上的對話—十七世紀的台灣與周邊》（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 年 12 月），頁 115-150。

<sup>23</sup> Wei-chun Chen, “The Early Occupation of Taiwan.” In Junko Habu, Peter V. Lape and John W. Olsen (eds.), *Handbook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Springer New York, 2018), pp. 277-292 at 287.

<sup>24</sup> 林昌華，〈The First Episode of Formosa Church: Robertus Junius (1629~1643)〉，《玉山神學院報》24（2017 年 6 月），頁 131-151。

<sup>25</sup> Natalie Everts, “Chapter 2: Siraya Concepts of Marria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Sincan: Impressions Gathered from the Letters of Two Dutch Missionaries.” In: Chen, Ya-chen (ed.), *(En)Gendering Taiwan : The Rise of Taiwanese Feminism* (Berlin: Springer Verlag, 2017), pp.13-24.

<sup>26</sup> José Eugenio Mateo Borao, “Chapter 2: The Formosa Catholic Mission, 1626–1895,” in Francis K.H. So, Beatrice K.F. Leung, Ellen Mary Mylod (eds.),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aiwan: Birth,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 15-37.

臺活動並遭遇到漢人居民的抗拒。歐陽安所發表的〈殖民接觸與族群互動：17 世紀早期的淡水與基隆〉亦廣泛運用了學者鮑曉鷗等人的研究成果，提綱挈領的將之綜合再述。

27

### 三、與中國及鄭氏政權相關研究

2016 年與中國和鄭氏政權相關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美國艾默利大學教授歐陽泰 (Tonio Andrade) 與布蘭代斯大學教授杭行所編輯 "Sea Rovers, Silver and Samurai: Maritime East Asia in Global History" 此一論文集的出版。此一論文集主要探討的是鄭氏政權的興衰及其面對的政治經濟環境。兩位編者在導論中，特別將幾篇論文劃入所稱東亞海域的「鄭氏時期 (The Zheng Period)」來探討，強調本書此主題達到挑戰「西方中心論」的目標，且呈現亞洲人的外交、文化體系，如何使西方人受困其中。唐人的網絡及其商業活動則如同魏而思 (John Wills Jr.) 所言在與西方文化的「互動性萌生 (interactive emergences)」中，有了新的表現。本書收錄的是原為 2011 年舉辦研討會時，所提出的論文。除了魏而思、包樂史的文章偏重於鄭氏家族內部關係的考證，是較為傳統的研究主題之外，盧正恆著重於鄭芝龍軍事團隊的形成、Adam Clulow 之文考證日本幕府對於荷蘭人劫奪唐人船隻之干預，均為較具新意的作品。<sup>28</sup> 杭行與鄭維中的文章則與臺灣較為相關，杭行 "Bridging the Bipolar: Zheng Jing's Decade on Taiwan, 1663-1673" 一文，強調鄭經在與清廷談判時採取「非屬中國」土地的辯論策略來保留其「明室認同」。他又引用《臺灣外記》中書舍人鄭德瀟之奏疏，以「司馬錯欲伐蜀」的前例來鼓動征菲一段，作為東寧政權已轉化為一王國的例證。鄭維中則以荷蘭文獻當中記載施琅征服臺灣後，曾向荷蘭俘虜提出條件，以讓出臺灣來交換荷蘭東印度公司善意一事，來說明施琅其實意圖繼承鄭芝龍在明季所獲得的特權地位，符合魏而思先前的猜測。<sup>29</sup> 魏而思於 2017 年過世，歐陽泰 (Tonio Andrade) 等人，為他所出版的紀念論文集，也於 2018 年出版，題為 *Early Modern East Asia: War, Commerce, and Cultural Exchange: Essays in Honor of John E. Wills, Jr.*。<sup>30</sup> 歐陽泰在其中寫了一篇 *Maritime China in global military history*。其內容僅是如蜻蜓點水般，觸及近代早期東南沿海歷史 (包括鄭氏集團在內)，指出其對於講述火器發展

<sup>27</sup> 歐陽安，〈殖民接觸與族群互動：17 世紀早期的淡水與基隆〉，《廈門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39 (2017 年 1 月)，頁 89-98。

<sup>28</sup> 盧正恆對於鄭芝龍軍事團隊的研究，似可與明末福建海防發展並觀。後者何孟興教授辛勤耕耘，近年亦有豐碩成果如：何孟興，《禦敵海上：明代閩海兵防之探索》，(台北市：蘭臺出版社，2017)。

<sup>29</sup> Hang Xing, 2016 "Bridging the Bipolar: Zheng Jing's Decade on Taiwan, 1663-1673," in Tonio Andrade and Xing Hang (eds.), *Sea Rovers, Silver, and Samurai: Maritime East Asia in Global History, 1550-170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238-259. 鄭維中，〈施琅「臺灣歸還荷蘭密議」〉，《臺灣文獻》61：3 (2010 年 9 月)，頁 35-74。

<sup>30</sup> Kenneth M. Swope, Tonio Andrade eds., *Early Modern East Asia-War, Commerce, and Cultural Exchange-Essays in honor of John E. Wills, jr.*, (London: Routledge, 2018) 本書出版時間可能落於本文斷限之外，考量其研究成果之重要性，仍納入此處討論。

的世界史乃是不可或缺的部分。<sup>31</sup> 杭行則在此書刊出一篇“The seventeenth-century Guangdong pirates and their transnational impact”將早年陳荊和舉出的鄭氏殘部楊彥迪等人的事例，重新納入衛而思的解釋架構來加以補充。在結論之處，他又補充在魏而思之外，Anthony Reid 已經將鄭氏集團視為「歷史上前所未有，在中國之外出現的個別的中国認同」，而強調這種「海外中國認同」，對於東南亞華人產生持續數個世紀的影響力。<sup>32</sup>與杭行所強調鄭氏政權在海外建立中國認同相對，王日根則從地域社會出發。他的作品〈鄭氏與明清王朝對漳汀泉海域社會控制權的爭奪〉一文中，將「鄭芝龍、鄭成功海上集團」定義為「明中葉崛起的海上割據勢力」。<sup>33</sup> 他指出鄭芝龍嚴密控制安海，廈門，海澄三處港市而「成為福建地方勢力中唯一能挑戰中央權威的特例」。此文雖短，但過去學者鮮有將鄭芝龍與鄭成功並稱，且定性為「割據勢力」者。此一論點後續的發展，值得注意。丁煌與何培夫編《海盜、香火·古港口：臺南研究先驅 黃典權紀念專著》一書，收錄有黃典權於 1947 年於廈門大學的畢業論文〈明末福建漳泉之海盜〉。此文雖完成甚早，此次卻為首度出版。本文結論中有謂「其(鄭成功)恃以抗清之主力則為芝龍舊部，即昔日縱橫閩粵海上之漳泉健兒」，也主張「海盜」「一變為抗清義旅」。<sup>34</sup> 黃典權雖未如王日根將之定性為「海上割據勢力」，大體上也承認其一脈相承的關聯。汪榮祖本年所出版的專書“China’s Conquest of Taiw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Victory at Full Moon”強調施琅攻取臺灣後，使得臺灣免於成為獨立王國或歐洲人殖民地。因此必須解釋，為何中國對此小島產生興趣，又為何這種合併不是出於殖民主義的動機，而是中國出於穩定海疆的理由自然造成。<sup>35</sup> 汪榮祖雖然同意歐陽泰於《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當中的論斷，即荷蘭人殖民引進唐人，造成臺灣歷史的變化，卻堅持鄭芝龍是在臺灣首先建立基地的唐人。汪榮祖也同意鄭芝龍成為南中國實際上的軍閥(warlord)，以及鄭成功繼承鄭芝龍勢力的觀點，與前述黃典權、王日根一致。但汪榮祖強調鄭氏於臺灣奉明抗清，挑戰清帝國的正統性，才是造成中國不得不以武力攻打臺灣的原因。<sup>36</sup> 汪榮祖對於鄭成功、鄭經之中國認同的強調，與杭行類似，但側重點有所不同，值得玩味。他亦強調鄭氏入臺的歷史與蔣介石入臺歷史的類似性，是他開始此類研究的動機之一。<sup>37</sup> 像這樣的感觸，是否可能與政治勢力介入塑造歷史意象有關？蔡明賢所發表的論文

<sup>31</sup> Kenneth M. Swope, Tonio Andrade eds., *Ibid.*, 100-118.

<sup>32</sup> Kenneth M. Swope, Tonio Andrade eds., *Ibid.*, 151-165 at 162. 杭行對同一主題另有文章如下: Hang Xing, "Leizhou Pirat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ekong Delta", in Ed. Robert Antony and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s., *Beyond the Silk Roads: New Discourses on China's Role in East Asian Maritime History*, (Wiesbaden, Germany: Harrassowitz, 2017), pp. 115-132. 筆者尚未取得此書。

<sup>33</sup> 王日根, 〈鄭氏與明清王朝對漳汀泉海域社會控制權的爭奪〉, 《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 (2017), 頁 121-128。

<sup>34</sup> 黃典權著, 丁煌、何培夫選編, 《海盜·香火·古港口: 臺南研究先驅黃典權紀念專著》(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臺北市: 蔚藍文化, 2017), 頁 41-68, 於頁 62。

<sup>35</sup> Wong Young-tsu, *China's Conquest of Taiw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Victory at Full Moon* (Singapore: Springer, 2017), pp. 2-4.

<sup>36</sup> Wong Young-tsu, *Ibid.*, pp. 200.

<sup>37</sup> Wong Young-tsu, *Ibid.*, pp. 2.

〈鄭成功意象與臺灣的再中國化(1945-1963)〉正巧探討了此一面向。蔡文指出「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國共內戰失利而播遷來臺，在歷史想像之若干情境與17世紀的鄭氏政權相近，鄭成功的反清而從荷蘭異族手中『復臺』之意象，即成為臺灣『再中國化』政治與文化建構的象徵...。」<sup>38</sup> 蔡文之研究，無意中與汪榮祖產生了跨世代的對話，提醒我人在近年來社會快速變動中，史家亦應惕勵自我，與過去的政治操作保持距離。康培德所發表“Koxinga and His Maritime Regime in the Popular Historical Writings of Post-Cold War Taiwan”也探討同樣的問題。他指出冷戰結束後，大部分臺灣的歷史書寫傾向於將鄭氏政權與大明帝國的情況區分開來。<sup>39</sup> 前述王日根的結論，賜與此一看法殊途同歸。

盧正恆所發表的〈雙面刃—清代施氏旗人家族與施氏漢人宗族研究〉則兼具理論與史料兩方面的內涵。他以施琅家族在清帝國存續骨幹的八旗制度，和與海洋事業有強烈聯繫的泉州地方宗族之間，如何生存發展為其研究事例。<sup>40</sup> 根據其研究成果，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均曾各自破例容許施氏旗人家族返回泉州施氏家族，達成兩處施氏族人的交流。但乾隆中期之後，隨著皇帝對於中間人的需求不再，兩處施氏族人卻逐漸走上陌路。此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閩南宗族在清帝國控制海疆的背景下，開發臺灣的軌跡，極具啟發性。鄧孔昭〈鄭經的婚姻情感生活與鄭氏集團的兩次內亂〉，雖細密考證鄭經婚姻的實態，並推敲其對於鄭氏集團內部統治關係的影響，卻主要從領導者的德行與王朝興衰的關聯來立論，與前述政治、經濟議題較少關聯。<sup>41</sup> 林津羽〈離散、帝國與嗣王：論鄭經《東壁樓集》的文化意蘊〉則與前述杭行的關懷點有所重疊，即所謂「個別在海外中國認同」在鄭經的詩文中如何展現。林津羽特別指出「嗣王」這個稱號的曖昧性，而由文化認同的角度思考了所謂海外中國認同當中的細緻區別，此點對於心態史方面的研究，似可供參酌。<sup>42</sup>

#### 四、新史料與新方法的應用

2017年度，近代早期臺灣史領域也有許多新史料被提出。最重要的史料出版應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所出版，方真真所編輯整理的《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

<sup>38</sup> 蔡明賢，〈鄭成功意象與臺灣的再中國化（1945-1963）〉，《人文研究學報》，51；1（2017），頁85-108，於頁86。

<sup>39</sup> Peter Kang, “Koxinga and His Maritime Regime in the Popular Historical Writings of Post-Cold War Taiwan,” in Tonio Andrade and Xing Hang (eds.), *Sea Rovers, Silver, and Samurai: Maritime East Asia in Global History, 1550–170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pp. 335-352.

<sup>40</sup> 盧正恆，〈雙面刃—清代施氏旗人家族與施氏漢人宗族研究〉，《歷史人類學學刊》15：2（2017），頁53-87。

<sup>41</sup> 鄧孔昭，〈鄭經的婚姻情感生活與鄭氏集團的兩次內亂〉，《台灣研究集刊》3（2017），頁83-89。

<sup>42</sup> 林津羽，〈離散、帝國與嗣王：論鄭經《東壁樓集》的文化意蘊〉，《淡江中文學報》37（2017），頁321-354，於頁346-348。同樣以《東壁樓集》為素材的研究尚有：魏亦均，〈漢字文化圈的板塊位移與知識重構：島／國視域下臺灣文學的轉向與明／鄭文學的生成〉（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惜筆者尚未得見。

(1626-1633)》。<sup>43</sup> 根據本書導論，這批檔案是在西班牙賽維亞的印地安總檔案館中，於會計室所收藏，屬於西班牙統治菲律賓時期的檔案。方真真由其中檢索出一千多件與西班牙佔領北臺灣地區有關的檔案，內涵主要是船隻由臺灣進入馬尼拉繳納商品稅的記載，以及馬尼拉政府必須支付北臺灣駐在人員的薪資。這批帳簿對於貨物品項記載較少，但對於人事背景卻透露出相當多的信息，利於細密分析駐在人員的生命史與生活史。賀安娟(Ann Heylen) “Mobility and Consistorial Discipline in Dutch Formosa: An Examination of Kerckboeck 1643-1649, Tayouan Consistory” 一文，則是利用新史料同時開發了新議題。<sup>44</sup> 本文運用了尚在出版當中的 Kerckboeck van Formosa(臺灣教會議事錄)這一批新資料。賀安娟考察了一位疾病慰問使，Gerrit Jansz Hartgring van Hasselt 在 1643-1648 年間，於臺灣島上服務時的空間軌跡，並且追蹤了教會內職場衝突，對於這種移置活動的影響。賀安娟也對於教會如何提供公司內部低階人員另類升遷的門路，做出考察。這個新的研究方法，啟發我們去認識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與其家鄉的遙遠距離，和他們生涯向上流動的關係，增進我們對於其生命境遇的理解。與此相類似的則是鄭維中所發表的“The Dutch Deserter Hugo Rozijn and His Activities in the East Asian Water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講述一位比利時裔的荷蘭士兵，如何在鄭成功攻打臺灣時投奔鄭氏政權，又如何施琅奪取臺灣後，再度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效力。<sup>45</sup> 本文所運用的多為十七世紀晚期的史料，而採取微觀史的角度，亦探討此一事跡是否與「安平追想曲」的傳說有關。陳宗仁所發表〈明朝晚期〈福建海防圖〉的繪製及其時代背景〉一文，探討 1995 年後為人所知，2011 年才有學者發表正式研究的一張古地圖。陳宗仁應用其一貫謹慎細緻的手法，按照圖中資訊來考證其年代斷限，並指出其時代意義在於：「十七世紀初期 20 年間，日本、呂宋、澳門、福建之間的貿易日益熱絡，臺灣島西岸正處於各股商業勢力往來路經之地，特別是福建商人、漁民往來閩、臺之間，對於福建人而言，「東番諸山」實乃東番諸港之意也。」<sup>46</sup>此可說是新地圖史料的出現，使得探討十七世紀閩南人的「臺灣想像」成為可能，是極富洞察力的作品。同樣，普塔克(Roderich Ptak)也持續追問宋代所記載「毘舍耶」由臺灣海峽寇掠中國沿海的記載，並且嘗試由《島夷誌略》所載「海外諸國、蓋由此始」一句，對照從泉州往菲律賓海路之考證，來推敲是否所記載的之「流求」確為臺灣原住民居地。他使用最近新出土的史料「賽爾登中國圖(Selden's map)」來擴展其推論的範圍。<sup>47</sup>同樣，黃樹仁則根據今人由澎湖拍攝臺灣群

<sup>43</sup>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1626-1633) La contabilidad relacionada con el norte de Taiwán en el periodo de la colonización española Vol. I: 1626-1633》，(台南市：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7)。

<sup>44</sup> 賀安娟，〈Mobility and Consistorial Discipline in Dutch Formosa: An Examination of Kerckboeck, 1643~1649, Tayouan Consistory (荷蘭時代的基督教規訓與社會流動：以〈大員宗教會書〉大員小會 1643 至 1649 年的教會手稿為中心的探討)〉，《臺灣史研究》24：1 (2017 年 3 月)，頁 1-36。

<sup>45</sup> Weichung Cheng, “The Dutch Deserter Hugo Rozijn and His Activities in the East Asian Water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Crossroads-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Exchange Relations in the East Asian World*, pp. 141-160.

<sup>46</sup> 陳宗仁，〈明朝晚期〈福建海防圖〉的繪製及其時代背景〉，《臺灣史研究》，23：3 (2016 年 9 月)，頁 1-42 頁，於頁 38。

<sup>47</sup> Roderick Ptak, “The Sea Route between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in Chinese Texts (c. 1100–1600): New Questions Related to an Old Theme,”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50:1 (2016), pp. 47-71.

山之照片以及「站在海邊 2 公尺高處，甚至可能望見 220 公里外 3626 公尺以上高山之巔」這樣的地球科學計算，重探前述宋元古籍的記載。<sup>48</sup>此雖不是使用新史料，卻使用了新論據。楊彥杰發表的〈一份難得的明鄭臺灣史料——從連橫《雅堂文集》的兩篇文章談起〉。<sup>49</sup>他從連橫提及，流傳於臺海兩岸的一份書稿談起，重新考察收藏於閩臺緣博物館的泉州風水書：《清源圖》，當中所包含的臺灣古地圖資料。楊比對諸多版本後，指出作者華佑，曾於臺灣東部地區的宜蘭、花蓮地區考察兩個多月，因而留存了鄭氏政權時期於臺灣東部採金活動的紀錄。臺灣歷史博物館近年來由江樹生主譯之《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與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則為過去近代早期臺灣歷史當中一些人物考據的爭議增添一些材料。例如陳思所發表的〈再論「何斌事件」的前因後果——兼議鄭成功收復臺灣前的一系列動作〉是根據《熱蘭遮城日誌》中的記載，彌縫中文史料當中不清晰的人時地問題<sup>50</sup>，同氏〈從各方史料看顏思齊與李旦及荷蘭殖民者之間的關係〉就根據前述《書信集》，論述顏思齊其人的可能面貌。<sup>51</sup>同類性質的文章尚有〈17 世紀 30 年代荷蘭殖民者與福建海商的關係——以「Bendiocq 事件」為例〉〈論 1622-1625 年間福建大海商李旦與荷蘭殖民者的關係〉，均為利用荷蘭翻譯史料對現存研究之補強。在臺灣方面，持續利用這些史料來對過去研究成果加以補強的尚有何孟興〈防海固圉：論明代澎湖與臺灣兵防角色之差異性〉〈情繫鄉關：看蔡獻臣在明天啟荷人據澎求市時之議論〉。

52

## 五、早期臺灣史通論與臺灣認同

2016 年賀安娟（Ann Heylen）曾有「Taiwan in late Ming and Qing China」一文，作為研究當代臺灣時的通論性歷史研究成果簡介。賀安娟解釋她使用「明清之際」是因為能將這一時期置於現行大多數西方中國史與地誌書寫的習慣性範疇中，使讀者能迅速取得相關資料。此文簡略說明了現行早期與清代臺灣史的歷史書寫脈絡、目前主流的敘事內涵、當前歷史寫作對於以上典範的挑戰。她並且主張越來越多對於原始資料的探討，將不斷更新這一段歷史敘述的內涵，但過去「大中國」的觀點與當前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出的政治正確敘事，則再再擠壓此一空間。<sup>53</sup>相對於賀安娟由當代臺灣研究的

<sup>48</sup> 黃樹仁，〈望見流求：從福建沿海觀測記錄論宋元明人的臺灣認識〉，《成大歷史學報》50（2016 年 6 月），頁 37-84。

<sup>49</sup> 楊彥杰，〈一份難得的明鄭台灣史料——從連橫《雅堂文集》的兩篇文章談起〉，《台灣研究集刊》158：4（2018 年 4 月），頁 56-67。

<sup>50</sup> 陳思，〈再論「何斌事件」的前因後果——兼議鄭成功收復臺灣前的一系列動作〉，《台灣研究集刊》147（2016 年 10 月），頁 68-76。

<sup>51</sup> 陳思，〈從各方史料看顏思齊與李旦及荷蘭殖民者之間的關係〉，《台灣研究集刊》153（2017 年 10 月），頁 79-85。

<sup>52</sup> 陳思，〈17 世紀 30 年代荷蘭殖民者與福建海商的關係——以「Bendiocq 事件」為例〉，《閩台文化研究》49（2017 年 3 月），頁 5-12。陳思，〈論 1622-1625 年間福建大海商李旦與荷蘭殖民者的關係〉，《閩台文化研究》46（2016 年 6 月），頁 18-24。

<sup>53</sup> Ann Heylen, "Taiwan in late Ming and Qing China," in Gunter Schubert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視角來書寫通論，劉益昌則將臺灣人群由新石器晚期，至文字書寫記載豐富的殖民時期之間的人群發展，簡要縱述於〈從史前文化發展過程談原住民分布與構成〉一文。他指出新石器晚期臺灣東部由於產玉，成為輸出商品，帶動人群技術交流，而使得 4-10 世紀間有練鐵技術引入臺灣，這群人能夠以高溫燒製紅陶，並經由蘭嶼-呂宋路線對外聯繫。9-10 世紀時，中國晚唐至宋代發展起海外貿易體系，增強了澎湖-呂宋路線而使臺灣對外聯繫衰落，使臺灣進入孤立的時期。此為臺灣考古學者少見的以臺灣與周邊地區物品交流變化，來解釋臺灣原住民與周邊地區發展步伐差異的通論性文章。由其所概括的時空範圍來說，很可能成為定論，值得注意。

2017 年早期臺灣史亦有通俗歷史出版物，即翁佳音、黃驗著《解碼臺灣史 1550-1720》。全書分為 51 個小節。翁佳音與黃驗在本書作者聯序中指出，本書「雖有 1550-1720 的年代斷限，但在編寫上，素材的剪裁、專題的觸角都相對開放、彈性，概因臺灣史的本質具有多種特性。」並指出臺灣史本質的特性為「貫時性」如「鄭規清隨」、「共時的」如長崎物語與安平追想曲「異曲同工」、「在地的」如「華武壟」這種洋化地名缺乏「在地感」。可說是一種臺灣新歷史書寫的宣言。其前言當中，又謂「編寫一部早期臺灣史的大眾讀本，是新的嘗試與挑戰，必須勇於面對各個角落的文獻荒原、歷史誤區。」由此看來，可謂兩位作者具體實踐了「但開風氣不為師」的真義。

正如賀安娟所說，臺灣歷史通論不免受到政治上的影響，其根源與臺灣社會現存的分裂認同狀態有關。王儀君發表“Cultural Encounters and Imagining Multicultural Identities in Two Taiwanese Historical Novels”一文，藉由觀察兩部臺灣歷史小說《三族記》與《荊桐花之戰》來探討在臺灣新近浮現的多元文化認同。<sup>54</sup> 王文認為，近二十年來臺灣社會中，有將原住民文化史納入臺灣認同當中的一股潮流。而這些小說作者正是將臺灣歷史中，並未由書寫歷史所呈現的、不斷發生的文化互動情況揭露出來。王文引用 Ann Curthoys 的說法，表示在移住殖民(settler colonialism)的情況下，移住殖民者(settlers)的歷史書寫通常無法全面呈現歷史，但是歷史小說卻可以多少提供道德上的判斷。此點與前述《解碼臺灣史》似有呼應，而兩者對於敘述與認同的關聯均相當關心，因此可歸屬於一般通論的部分。

## 六、小結

2016-2017 年度的早期臺灣史研究領域，無論在與荷西殖民活動相關的研究上或與中國、鄭氏集團上相關的研究，都有相當的進展。不只在史料上推陳出新，在研究上多有集大成者，所關懷的問題也轉向較為抽象綜攝的角度。例如對於荷西殖民活動的觀察，

---

*Taiwan*,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 7-21.

<sup>54</sup> Wang, I-Chun, "Cultural Encounters and Imagining Multicultural Identities in Two Taiwanese Historical Novels," in Jane Yeang Chui Wong (ed.), *Asia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 41-57.

肯定了當時唐人在臺的開墾活動，具備移住殖民主義的性質；也針對史料本身可能呈現的偏頗觀點，作出批判，而將歷史論述與歷史事實兩者明確加以區分。在與中國和鄭氏集團相關的研究上面，也有類似的趨勢。一方面將鄭氏集團的活動與中國海防的脈絡分離，另一方面探討其中國認同的曖昧性，並明確的將之與過去政治干預造成的歷史形象分離，這些都是值得持續關注的趨勢。

## 參考書目

### 中日文

方真真（主譯）

2017 《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1626-1633）La contabilidad relacionada con el norte de Taiwán en el periodo de la colonización española Vol. I: 1626-1633》。臺南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王日根

2017 〈鄭氏與明清王朝對汀漳泉海域社會控制權的爭奪〉，《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121-128。

古慧雯

2017 〈十七世紀荷日貿易中臺灣所扮演的角色〉，《經濟論文叢刊》46（2）：209-234。

石萬壽

2017 〈鄭氏三世建置媽祖廟新探〉，《新世紀宗教研究》，15（4）：59-85。

李德河

2017 〈荷蘭人的澎湖城與大員熱蘭遮城〉，《碇砧石》86：126-141。

林津羽

2017 〈離散、帝國與嗣王：論鄭經《東壁樓集》的文化意蘊〉，《淡江中文學報》37：321-354。

洪傳祥

2017 《臺灣與麻六甲的荷蘭港埠規劃溯源》。臺南市：成功大學出版社。

高賢治

2017 〈從古地圖看臺灣名稱的由來〉，《臺灣風物》67（4）：11-18。

陳緯華

2017 〈國家、象徵暴力與民間信仰：以鹿耳門天后宮為例的討論〉，《文化研究》25：139-182。

康培德

2017 〈十八、十九世紀巴達維亞唐人對殖民地行政體系的文化認知賦予與重塑——《公案簿》中的官職、機構外來語為例〉，《漢學研究》35（1）：261-290。

董純好

2017 〈熱蘭遮城功能之變遷（1624~迄今）〉（臺南市：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彥杰

2018 〈一份難得的明鄭臺灣史料——從連橫《雅堂文集》的兩篇文章談起〉，《臺灣研究集刊》158（4）：56-67。

鄧孔昭

2017 〈鄭經的婚姻情感生活與鄭氏集團的兩次內亂〉，《臺灣研究集刊》23：83-89。

蔡明賢

2017 〈鄭成功意象與臺灣的再中國化（1945-1963）〉，《人文研究學報》51（1）：85-108。

鄭維寬

2017 〈明清之際北部灣地區的海寇與海疆經略〉，《廣西師範大學學報明（哲學社會科學版）》2：1-8。

鄭維中

2018 〈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在臺海兩岸間的水文探測活動(1622-1636)〉。載於劉序楓（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頁 385-440。台北市：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17 〈1624 年大員港的浮現：兩場遙遠戰爭的遺緒〉。載於李其霖（編），《宮廷與海洋的交匯》，頁 203-226。新北市：淡大出版中心。

盧正恒

2017 〈雙面刃－清代施氏旗人家族與施氏漢人宗族研究〉，《歷史人類學學刊》15（2）：53-87。

魏亦均

2017 〈漢字文化圈的板塊位移與知識重構：島／國視域下臺灣文學的轉向與明／鄭文學的生成〉。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聰敏

2016 〈從貿易與產業發展看荷治時期臺灣殖民地經營之績效〉。《經濟論文叢刊》2016 年 9 月，44（3）。

郭素秋

2017 〈彰化平原史前末期與 17 世紀跨部落勢力關係探討〉，收於陳玉美、郭素秋（主編），《地下與地上的對話—十七世紀的台灣與周邊》，頁 67-113。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劉益昌

2017 〈存在他者記憶的人群— Favorlang〉，收於陳玉美、郭素秋（主編），《地下與地上的對話—十七世紀的台灣與周邊》，頁 115-150。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徐子懿

2016 〈荷蘭時代臺灣稅課與漢人經濟社會的形成（1624 年至 1640 年代中期）〉。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歐洋安

2017 〈殖民接觸與族群互動：17 世紀早期的淡水與基隆〉，《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39：89-98。

陳宗仁

2016 〈明朝晚期〈福建海防圖〉的繪製及其時代背景〉，《臺灣史研究》23（3）：1-42。

陳思

- 2017 〈從各方史料看顏思齊與李旦及荷蘭殖民者之間的關係〉，《台灣研究集刊》153：79-85。
- 2016 〈再論「何斌事件」的前因後果——兼議鄭成功收復臺灣前的一系列動作〉，《台灣研究集刊》147：68-76。
- 2016 〈17世紀30年代荷蘭殖民者與福建海商的關係——以「Bendiocq事件」為例〉，《閩台文化研究》，49：5-12。
- 2016 〈論1622-1625年間福建大海商李旦與荷蘭殖民者的關係〉，《閩台文化研究》46：18-24。

## 外文

Blussé, Leonard

- 2017 "Chapter 3: Dueling Wills—Dutch Administration and Formosan Power, 1624-68." In Kenneth M. Swope & Tonio Andrade (eds.), *Early Modern East Asia War, Commerce, and Cultural Exchange*. London: Routledge, 65-82.

Borao, José Eugenio Mateo

- 2018 "Chapter 2: The Formosa Catholic Mission, 1626-1895." In Francis K.H. So, Beatrice K.F. Leung, Ellen Mary Mylod (eds.),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aiwan: Birth,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Cheng Weichung

- 2018 "Putchok of India and Radix China: Herbal Exchange around Maritime Asia via the VOC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30(1), 75-117. (TSSCI).
- 2017 "Emergence of Deerskin Exports from Taiwan under the VOC (1624-1642)".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24:(3), 1-48.
- 2017 "The Dutch Deserter Hugo Rozijn and His Activities in the East Asian Water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Crossroads-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Exchange Relations in the East Asian World*, 16, 141-160.

Chen, Wei-chun

- 2018 "The Early Occupation of Taiwan." In Junko Habu, Peter V. Lape and John W. Olsen (eds.), *Handbook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Springer New York.

Everts, Natalie

- 2017 "Siraya Concepts of Marria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Sincan: Impressions Gathered from the Letters of Two Dutch Missionaries." In Chen, Ya-chen (ed.), *(En)Gendering Taiwan : The Rise of Taiwanese Feminism*. Berlin: Springer Verlag, 13-24

Hang Xing

- 2018 "The Seventeenth-century Guangdong Pirates and Their Transnational Impact." In Kenneth M. Swope and Tonio Andrade, *Early Modern East Asia: War, Commerce and Cultural Exchange Essays in Honor of John E. Wills*, 151-165. Jr. London: Routledge.
- 2017 "Leizhou Pirat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ekong Delta." In Ed. Robert Antony and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s., *Beyond the Silk Roads: New Discourses on China's Role in East Asian Maritime History*, 115-132. Wiesbaden, Germany: Harrassowitz.
- 2016 "Bridging the Bipolar: Zheng Jing's Decade on Taiwan, 1663-1673." In Tonio Andrade and Xing Hang (eds.), *Sea Rovers, Silver, and Samurai: Maritime East Asia in Global History, 1550-1700*. 238-259.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eylen, Ann

- 2017 "Mobility and Consistorial Discipline in Dutch Formosa: An Examination of Kerckboeck, 1643-1649, Tayouan Consistory."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24(1): 1-36.

Kang, Peter

- 2017 "From Whale Bone (Walvis Been) to Table Mountain (Taffelberch): the Place Naming of the Dutch on the Landscapes of Seventeenthcentury Taiwan." *Nomina Africana*, 31(1): 69-76.
- 2016 "Koxinga and His Maritime Regime in the Popular Historical Writings of Post-Cold War Taiwan." In Tonio Andrade and Xing Hang (eds.), *Sea Rovers, Silver, and Samurai: Maritime East Asia in Global History, 1550-1700*, 335-352.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tak, Roderick

2016. "The Sea Route between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in Chinese Texts (c. 1100-1600): New Questions Related to an Old Theme."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50(1), 47-71.

Tseng, Hua-pi

- 2017 "Sugar Cane and the Environment under Dutch Rul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Taiwan." In Cristina Joanaz de Melo, Estelita Vaz, Lígia M. Costa Pinto (ed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Making Volume II: Acting*, 189-200.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

Wang, I-Chun

- 2018 "Cultural Encounters and Imagining Multicultural Identities in Two Taiwanese Historical Novels." In Jane Yeang Chui Wong (ed.), *Asia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41-57.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Wong Young-tsu

- 2017 *China's Conquest of Taiw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Victory at Full Moon*, Singapore: Springer.